

风起潮涌的一九五六年

——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梁 柱

(北京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北京 海淀 100871)

【摘要】1956年是人民共和国值得铭记的一年。这一年,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面对由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引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动荡,要求科学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与历史经验;提出了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开始了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伟大历程。这三件大事,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提供的思想理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苏共二十大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6)04—0019—08

DOI:10.16223/j.cnki.cn61-1456/c.2016.04.003

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1956年是值得铭记并加以浓墨重彩的一年。这一年,在毛泽东领导下,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面对由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引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动荡,科学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与历史经验;提出了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开始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伟大历程。这三件大事,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提供的思想理论、历史经验和国家应当坚持的发展方向,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1956年,我国顺利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从此,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奠定了制度基础和开辟了康庄大道。对于我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

性及其历史意义,至今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这不仅为了回答来自某些方面的质疑之声,而且也是我们今天进行改革必须坚持的出发点和发展方向。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既包含它是民主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反映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就前者而言,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失去了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能力,在这种历史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历史性贡献,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的前途相联结,并通过实际的步骤加以实现。毛泽东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连结点问题,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决不可能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成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

【收稿日期】2016-06-27

【作者简介】梁柱,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由之路。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社会既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它既存在资本主义的因素,又存在不断生长中的社会主义的因素。毛泽东领导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就反映了上述特点。拿经济纲领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还要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成分,以利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同时,为防止资本主义经济任其自由泛滥危害整个国民经济,对其采取了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这主要是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毛泽东特别强调不能动摇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新民主主义国家必须优先发展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经济,使这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导向的、决定性的作用,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强大的物质基础。这种立足于现实又为未来发展准备条件的策略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纲领中也都得到生动的体现。正是这种自觉的、反映历史发展要求的政策导向,使民主革命的结果顺利转向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就后者而言,任何社会变革归根到底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是这样一种历史的要求和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仅仅经过三年的时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就达到和超过国民党时期最高的1936年水平。正如陈云所说“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1]366}这就把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提上日程。通过国家的工业化来实现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国家富强的理想。近代中国历史已证明,以资本主义为取向的国家工业化道路是走不通的,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不仅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向,是中国人民的主体性选择,而且这时也基本具备了实现的条件。

第一,有了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这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1949年为34.2%,

1952年则上升到56%。与资本主义的私营工业相比,国营工业不仅规模大,而且技术设备相对先进;不但有轻工业,而且有重工业。要实现国家工业化,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这首先和主要的是依靠和办好原有的国营工业;另一方面要建设新的工业,这主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国营工业,包括对原有国营工业的改造扩建。因为在中国,私营经济是没有能力投资兴建新的、足以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基础的那种大型工矿企业的。因而,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首先意味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先天不足,发展维艰,难以成为国民经济起飞的基地。中国民族资本的主体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民族工业资本在整个民族资本中只占1/5,且主要分布在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据解放初期的统计,雇工500人以上的工厂在民族资本主义工厂中只占0.1%,69.7%的工厂只有不到10个工人,79.1%的工厂属于工场手工业。在这样弱小的基础上,靠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把中国建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显然是极其困难而缓慢的。诚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一定时期内有对于国计民生有利的积极作用和不利的消极作用。建国初期国家通过正确的政策帮助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存和发展,而这时资本主义工业对于生产的发展和新建工业的建设也负有重要的责任。但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和政府、国营经济乃至社会之间“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下,成本高,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没有,因而导致工业产品短缺,使国家计划的完成受到严重影响。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一很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合理的充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以上两方面的情况,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需要进一步改组,而且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2]350}。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又一个基本因素。

第三,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样是生产力发展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客观要求。土地改革使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使之在一个时期内获得迅速发展。但是,土改后的农业经济

仍然没有改变其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性质,生产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许多农户不仅无力扩大再生产,有的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由于力量单薄,遇到自然灾害,更是没有抗御能力。如果不引导个体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不仅不能进一步发展农村生产力和改善农民的生活,而且农村也不可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等条件,从而严重制约工业化进程。拿工业发展急需解决增加粮食产量为例,陈云曾说当时解决的途径有三:开荒,修水利,合作化。前两项国家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要有配套工程,周期长,见效慢。他说“这些办法都要采用,但是见效最快的,在目前,还是合作化”。“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三十”。“并且只有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各种增产措施才容易见效”。^{[3]238-239}个体农业的这种状况,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第四,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决定我们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外因。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的严密封锁。中国不仅不可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通常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战后争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同情和支持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这种援助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建立我国工业化的基础起了重要作用。这种国际环境,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正是上述多方面的因素构成了水到渠成的历史合力,把我国推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胡乔木认为,“中国经济在五十年代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部而论,重要的是,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分,经济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应有的灵活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4]345,353}这是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评价。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国民经济的

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虽然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这主要是“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造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恰当”。但从总体上来说,是代价最少,收获极大,是在得到人民群众普遍欢迎和支持、社会平稳和生产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范围的社会变革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紧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主要是:一是坚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注意以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毛泽东一再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5]1}他说:“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6]432}这反映在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中,就是坚持“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正确方针。这对于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生产发展,逐步提高人民生活,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事实表明,在1953—1956年我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9.6%,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8%,经济运行及其效益良好。1956年农业改造高潮期间,我国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总产值还是增产了4.9%,其中粮食比上一年增产4.4%。其原因是同组织起来的优越性相关联的。同样,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也表现了它的优越性。1955年,公私合营工业比私营工业的工人劳动生产率平均高出一倍。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合营工业的产值比上一年增加了32%。这些事实有力地证明,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没有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而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二是采用和平方法进行改造。毛泽东说:“在我国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

义所有制。”^{[5]2}这里要特别指出,党还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及其在历史和现实中的表现,以和平赎买的方法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通过支付定息、安排工作和思想教育的方法,鼓励工商业者在劳动和工作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党通过和平改造的方法比较顺利地解决了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和平改造与消灭私有制、企业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的问题。三是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都创造了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形式。这既有利于我们积累经验,逐步地、有序地推进改造工作,又能够有效地避免剧烈的社会震荡和生产受损失。

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是符合历史正确的结论。

二

1956年,毛泽东称之为“多事之秋”。就国际上说,始作俑者,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并由此引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动荡。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在原定的四项议程全部完成之后,于次日(2月25日)上午召集秘密会议,应邀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则没有收到参会通知。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他在揭露斯大林搞个人迷信,破坏集体领导原则和法制的名义下,以大量篇幅讲述三十年代的大规模的镇压行动,把犯有严重扩大化错误的肃反运动,描绘成一场斯大林为排除异己滥杀无辜的惨剧,并强调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指使和纵容下进行的;认为个人崇拜是由于“斯大林任性、粗暴、专横,滥用职权,自我吹嘘和缺乏最基本的谦虚精神”等所谓的个人品质造成的。对于这个秘密报告,作为当时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的邓小平说“我们在会议期间没有听到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下午,苏共中央联络部拿着报告到代表团住处,说受苏共中央委托,有重要文件给中共代表团通报。实际上不是什么通

报。而是由翻译念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们的翻译边看边口译,念完苏方就拿走,只念了一遍。当时感觉报告很乱,无条理,就听到了一大堆关于斯大林破坏法制、杀人、靠地球仪指挥战争、对战争毫无准备等等,还讲了一个南斯拉夫问题,其他政策性的错误无甚印象。当时我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随后我们就根据记得的电报中央了。”^{[7]4-5}对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可能导致的后果,毛泽东说“现在全世界是否要来一个反共高潮,我们也没有办法。人家要反,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我们自己要硬着头皮顶住。”^{[7]15}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性。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后不久,秘密报告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反苏反共的实用武器。他们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为由头,集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反苏反共的浪潮。同时,由于赫鲁晓夫采取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态度,一意孤行,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巨大分歧。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西方敌对势力反苏反共的宣传很快得到奏效。许多原来同情和支持苏联的左派人士开始对苏联持批判态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内部发生了分裂,有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退出了组织。后来英国共产党总书记高兰在莫斯科同毛泽东会见时曾谈起当时的情形,他说“斯大林问题发生后,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们认为,苏联同志把斯大林处理得很坏很坏。这本来就是困难和复杂的问题,但是处理的结果又造成了最大限度的困难。我们党内的各种修正主义思想都发泄出来,其中有一种思想认为我们党没有前途。我们多数党员是坚定的,但是我们丧失了七千党员。”也正是在这种非斯大林化的氛围下,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矛盾也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苏共二十大后相继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就是突出的例子。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毛泽东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商讨我们要“取什么方针”。

在这场将影响到世界社会主义的走向和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沉着应对,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态度,科学对待斯大林这样的历史人物,正确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维护十月革

命的道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经毛泽东的提议,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多次讨论的意见,于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这里要指出,这两篇文章不仅主要观点都是毛泽东提出的,并且经过他多次修改定稿的,是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和观点。

在苏联解体已20多年的今天,重新审视当时我们党发表的这两篇文章,其基本观点仍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它不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限于篇幅,仅举两点说明之。

其一,要正确对待历史,这是我们进行改革和坚持社会主义的重要立足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绝不只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帝国主义正是利用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历史实践。因而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斯大林,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就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做法,明确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因此,“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5]91}这样具体的、全面的分析,分清了事物的主流和支流,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有说服力的。“两论”进一步分析了斯大林的错误在他的一生及他所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历史中的位置,指出“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从整个说来,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

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侵害所必需的。”文章深入分析了斯大林在苏联的内外政策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及其危害,同时又客观地指出,这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因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同志的错误。文章针对当时一些人大反所谓“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做法,严肃指出“共产主义者采取这种说法是极端有害的。”“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而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实质上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这是十分有害的。事实表明,只有采取客观的分析的态度,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斯大林错误及与其相关的社会主义历史问题,也才能捍卫我们应当捍卫的原则。

其二,要善于对待历史经验,勇于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1956年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中,还涉及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问题,也就是说,十月革命的道路还灵不灵?这是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历史紧密相关的,必须给予正确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文章指出“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说,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文章概括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这主要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党的政党,它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在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阶级,消灭阶级;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逐步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

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文章指明这是反映十月革命道路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这“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意义”。上述这种区分,为我们回答十月革命道路还灵不灵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同时也指明了应如何正确对待苏联的经验。“苏联的全部经验,包括某些错误和失败的经验在内,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经验尤其重要。”这就是说要取分析的态度,重要的是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运用这些基本经验。

上述表明,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历史经验,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两论”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对我们党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及后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事业中,能够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三

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正是这种揭开盖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考 and 探索。毛泽东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说,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

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7]23-24}在这里,毛泽东把“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是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

很显然,在毛泽东看来,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并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过程。现在,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提到党的面前,毛泽东敏锐地提出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使命,就是要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这反映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反映了他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战略思考。

关于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起点问题,有学者定为新中国成立之时,因为是要解决国家富强问题。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它既不符合毛泽东的原意,也不符合历史实际。新中国成立之时,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确立,还主要是照搬苏联的一套东西,这个时候怎么有可能提出“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的任务呢?所以,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起点,只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提上日程之时,而苏共二十大提供了这样一个“以苏为鉴”的历史机遇,也就是说,要解决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1956年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作出的《论十大关系》一文,正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开篇之作。

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的探索有着明确的主题,这就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相联系的。在建国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毛泽东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8]305}建国初期从苏联学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这种

高度集中体制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由于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因而比较早地认识到,建设道路也同样不能照搬外国。这正如毛泽东后来谈到建国初期照搬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8]117}。这使得毛泽东等人对当时经济体制及管理体制,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发觉统得太死,不行,着手改进体制”^{[9]414}。这样,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新课题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工作。这时,正是通过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促使我们党重新审视苏联模式的利弊得失,重新审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探索自己的道路的思路就更加明确了。这就是说,要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东欧、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建设道路,就是这个时期探索的主题。毛泽东提出的许多改革性的重要思想和措施,也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像毛泽东在这时探索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就是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现实出发,把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工业化道路提了出来,并据此确立了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以及后来明确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应当说,这条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确立,对于走出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具有典型性的意义。

毛泽东提出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外国经验。他在这时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5]41}。他以学习苏联为例,指明教条主义的危害。在民主革命时期,“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毛泽东强调,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否则革命就不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成功。同时他还强调,向外国学习必须要有民族自信心。毛泽

东指出,我们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正因为这样,“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这就容易产生崇洋媚外、迷信外国的思想。毛泽东号召大家“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5]79.43}。我们既要善于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又要重视和发展民族的东西。要学习外国的长处,来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造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东西。要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总之,“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上述这些重要观点,对我们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正确处理中国和外国、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外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应当说,毛泽东这时提出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是一个历史性的战略任务,在一定意义上说,今天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第二次结合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为此提出的探索的主题和许多重要的思想原则以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于今天通过改革开放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都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这里还要指出,毛泽东在探索自己的道路的同时,还努力探索一条能够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这是毛泽东毕生致力于争取人民主权和维护人民主权的一大战略思考。当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仅是初见端倪的时候,他就提出以民主新路来跳出“其兴也浚,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在为建国作思想上和政策上准备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并警示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这就实际上把党执政后反腐败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1958年,当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开始大力兜售“和平演变”战略的时候,毛泽东最早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敲响了防止“和平演变”的警钟。从这时起,他就把七届二中全会确

定的防止腐蚀方针同防止“和平演变”结合起来。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各级干部脱离群众,蜕化变质,防止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的滋生,是毛泽东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他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建国后的一个时期,革命队伍中确有少数人出现严重的蜕化变质倾向。对此,毛泽东从对人民负责、捍卫人民政权性质的高度,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及时地通过“三反”、整党等斗争,制止住了这种腐败现象。毛泽东严肃地把大贪污犯斥为“人民的敌人”,是“叛徒与毒虫”。薄一波回顾这一斗争时曾提到,当时在处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问题上,有同志考虑刘、张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希望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当薄一波向毛泽东转达这一意见后,他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薄一波写道“由此可见毛主席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的腐化上面。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作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9]152-153}

在毛泽东看来,腐败现象本身就是和平演变的

一种表现,他甚至认为,资产阶级糖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因而对惩治腐败现象毫不手软。他极力寻求克服阴暗面的方法,并为此作了种种尝试,由于当时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甚至走向了反面,但他在这方面的一些重要思想是值得认真研究和学习的。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会使后人变得更加聪明。毛泽东在探索中所积累的正面经验及其在曲折发展中所提供的反面经验,都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正面临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国内正进行的历史性变革的关键时刻,进一步认识毛泽东探索的重大战略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其合理的因素,继续完成毛泽东提出的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课题。

参考文献:

- [1]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5]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6]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7]吴冷西.十年论战[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 [8]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9]薄一波.若干重大问题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曹祖明】

1956 , a Turbulent Year – – Lessons and Insights from the Exploration of Socialism

LIANG Zhu

(Center for the System of Theor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Peking University , Haidian ,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1956 is a year worthy of remembering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in which China had basically completed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ownership of production means and established the socialist system. In face of the great turbulenc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caused by the total negation of Stalin by Khrushchev at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rged people to keep the history and historic experience in perspective , and put forward the historical task of combining Marxism and Leninism with the specific situation in China for the second time , and embarked on its journey to explore its own road to socialism. The three major events have profound historic significance and the thoughts and theories offered are still of great values till today.

Key Words: 1956;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